

澳门外劳群体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陈平

摘要: 澳门外劳群体已成为澳门人口、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澳门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但也引发了社会矛盾,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澳门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外劳进退两难, 澳门社会对其关顾有别, 外劳群体的城市归属感愈加不足。通过回顾城市归属感的结构与维度、城市归属感的归因理论、城市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素等成果, 对澳门外劳群体的数量和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沿用四维度模型对澳门外劳群体的城市归属感进行测量, 并综合比较两项关于酒店企业外劳归属感的研究, 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增加有助于提升酒店企业外劳的城市归属感, 但是准入政策、社会保障、政治权利、居民态度等制度性和根源性的障碍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 对于澳门外劳群体整体而言, 收入高于其来源地、消费支出成本低等经济的维度才是决定其能否融入本地社会的根本原因。尊重外劳的劳动价值以力争同工同酬, 改善外劳的社会福利以丰富补贴补助, 强化外劳的职业培训以增加竞争能力, 畅通外劳的上升通道以提升职业地位, 持续夯实外劳的人力资本, 至少在经济维度实现同城同权的城市归属感。

关键词: 澳门; 外劳; 社会融合; 城市归属感; 影响因素

作者: 陈平, 博士,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邮箱: pingchen@must.edu.mo

Title: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ity of Macau's Foreign Workers

Abstract: Macau's foreign worke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acau's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They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y have also caused social conflicts. Especi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Macau's economy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and foreign workers are in a dilemma, and the society is different in its car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foreign labor group in the c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sufficient. By reviewing the structure and dimensions of the city's sense of belonging, the attribution theory of the city'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he specif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ity's sense of belonging,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the foreign labor group in Macau, and uses the four-dimensional model to analyze the foreign labor group in Macau.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city is measured, and two studies o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foreign workers in hotel companies are comprehensively compa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in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apital can help improv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foreign workers in hotel companies. However, the access policy Institutional and root obstacles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political rights, and residents' attitudes are difficult to eliminate in the short term. Therefore, for the overall group of foreign workers in Macau,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income are higher than their source of origin and low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cost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determines whether it can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society. Respect the labor value of foreign workers to strive for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improve the social welfare of foreign workers to enrich subsidies and subsidies, strengthen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foreign workers to increase competitiveness, smooth the upward channel of foreign worker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tatus, and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the human capital of foreign workers , At least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to realiz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same city with the same power.

Keywords: Macau; foreign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urban belonging; influencing factors

Author: Chen Ping,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pingchen@must.edu.mo

引言

长期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施政和工商界一向贯彻本地人优先就业和向上流动原则，加之澳门严格的移民政策、昂贵的居住和生活成本、候鸟般的两地奔波、差距明显的同工不同酬、无法享受的社会福利等，外劳群体在澳门缺乏城市归属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外劳为澳门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外劳群体在澳门社会引发颇多争议，与本地居民的对立情绪不断激化，外雇退场呼声持续高涨。多元文化共存的澳门，在面对和处理外劳问题上，没有彰显出足够的城市包容精神。那么影响澳门外劳群体城市归属感有哪些因素？在哪些维度能够做出现实安排以提升澳门外劳群体城市归属感？因此，有必要系统回顾外劳城市归属感的相关研究，客观认识和检讨澳门外劳城市归属感的现状，深度解析澳门外劳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科学可行的建议。

一、外劳城市归属感研究综述

城市归属感是外来务工人员对所在务工城市工作与生活状态及其心理感受的一种综合评判，¹所产生的对城市的满意和依恋程度，²存在着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等两方面相互冲突矛盾的状态，³对务工城市生活的适应方式上，存在着“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和“主动融入”两种模式。⁴外劳城市归属感缺失的主要外部原因包括不合理制度、城市社会对外劳认同程度低等因素，⁵其内

- 1 朱平利，杨忠宝：《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44-53页。
- 2 高健，吴佩林：《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城市问题》，2016年第6期，第4-13页。
- 3 冯婧：《隐形因子对农民工归属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1期，第53-61+111页。
- 4 邓睿，冉光和，肖云等：《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4期，第58-69+111-112页。
- 5 闭伟宁，张桂凤：《从社会交往特点看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的调查》，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16-120页。

部原因是社会网络以老乡、亲戚等熟人为主，局限在小圈子内，缺少与本地社会的沟通与交流，难以获得当地居民群体的认可，从而受到排斥。⁶由此可见，外劳城市归属感的意味着外劳对务工城市的社会融合。

（一）城市归属感的结构与维度

“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概念（杨菊华，2009）⁷，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而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张文宏、雷开春，2008）⁸。西方社会提出的社会融合理论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 Gordon 为代表的“二维”模型（结构性融入和文化性融入），二是杨格-塔斯（J. Junger-Tas）等人为代表的“三维”模型（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三是恩泽格尔（H. Entzinger）等人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⁹虽然社会融合包含多个层面的融合，但国外研究者们倾向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变量维度对社会融合的概念进行界定。¹⁰国内几乎所有研究都包括了经济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合等维度。¹¹目前，恩泽格尔的“四维度”模型被广泛接纳和应用。一般认为，经济融入是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¹²

6 史溪源：《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分析——以社会流动的视角》，济南：《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4-7页。

7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北京：《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第17-29页。

8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117-141+244-245页。

9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兰州：《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8-27+126页。

10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兰州：《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8-27+126页。

11 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北京：《人口研究》，2012年第3期，第27-37页。

12 DUSTMANN, Christian. The Social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6, 9. 1:37-54.

主要通过外劳与务工城市的平均水平的差距来进行测量。¹³ 社会融入则体现在社会关系、规范、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等方面, 表现为社区互动交往、社会组织参与、亲属关系等。¹⁴ 政治融入则表现在务工城市的政治权利、政治选举、工会等政治参与。¹⁵ 此外, 还有不同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融入。¹⁶ 由此可见, 不同的融入维度, 其内涵在具体的研究中没有绝对清晰的区分, 相互交叉和互补, 总的来说还是结构与文化的二元划分。

(二) 城市归属感的归因理论

研究发现, 由于与本地居民获得的资源及发展存在差距, 外劳群体在就业、住房、教育等结构性融入要素方面, 以及公民权利、社会参与、价值意识等文化性融入要素方面, 均与本地社会发生了割裂。¹⁷ 如何解释外劳的孤立与排斥, 以及务工城市对外劳社会融合的限制? 国外学术界形成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因论与制度归因论等三种理论, 解释外劳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务工城市的移民融入制度或政策的影响。根据人力资本归因理论, 外劳的教育水平、技能、语言、经验等人力资本对于其社会融合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归因论则认为, 外劳在务工城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和可动用的社会资源, 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其社会融合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制度归因论更强调务工城市针对外劳就业、社会福利、住房、子女教育、宗教信仰、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13 Hum D, Simpson W.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to Canada: A Short Survey.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2004, 13.6: 46-61.

14 JACOBS, Dirk; TILLIE, Jean. Introdu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4, 30.3: 419-427.

15 HEISLER, Barbara Schmitter. The Future of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Which Models? Which Concep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2, 26.2: 623-645.

16 Hackett W C.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Practitioners of Non-Western Reli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03, 42.4:651-667.

17 DÖRR, Silvia; FAIST, Thomas.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Welfare States: A Comparison of The Literature on Germany, France,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7, 31.4: 401-426.

（三）城市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素

王金营等（2020）认为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面，将归属感缺失归因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社会福利分配不公、城市对农民工的认知欠缺、进城生活的高成本；微观层面包括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个人素养、经济物质情况、社会互动网络、心理文化。¹⁸李辉等（2019）从个体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三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本地务工年限、劳动时间、住房性质、本地人是否歧视、对本地话的掌握程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影响。¹⁹朱平利、杨忠宝（2019）构建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察经济物质、社会互动网络和心理文化三个层面对进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²⁰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丰富的基础。但是要注意，澳门与外劳群体的来源地既不能以“城乡”直接进行界定，澳门外劳群体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农民工”，又由于澳门外劳城市归属感的尚无专门研究，因此相关维度和变量能否适用于澳门外劳群体仍有待检验。

二、澳门外劳群体社会融合的维度

20 世纪 80 年代，澳门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产生矛盾，开始输入外劳。截至 2019 年底，澳门外劳群体达到 196,538 人的规模，主要来自中国内地、菲律宾、越南、香港、印尼、泰国

18 王金营，黄卓：《新就业形态下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杭州市电商相关从业人员的调查》，南京：《人口与社会》，2020 年第 4 期，第 1-17 页。

19 李辉，韩东，温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研究》，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第 119-127+2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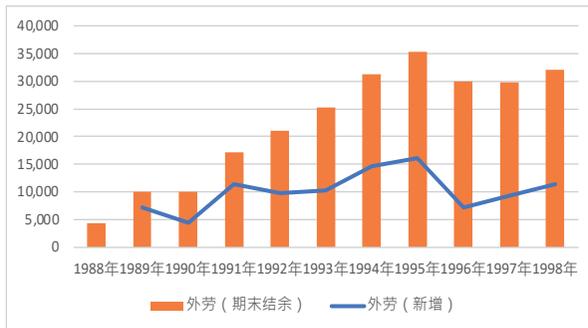
20 朱平利，杨忠宝：《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44-53 页。

和马来西亚等，覆盖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及零售业、酒店及餐饮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家务工作等。²¹ 外劳缓解了澳门劳动力不足带来的经济发展困境，降低澳门企业的用工成本，提升本地劳动生产率。²² 但是，外劳的输入对澳门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收入造成影响，也是社会矛盾持续演进和嬗变的原因之一，由此也引发了一定的社会不满情绪。这也在心理文化层面导致了外劳群体与澳门社会融合程度持续降低，为此，首先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前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澳门外劳群体的结构，判断澳门外劳群体的社会融合主要体现在哪些维度。

（一）澳门外劳群体的数量

澳门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²³ 其中外劳群体的数量与规模最大。1988年，澳葡政府公布输入外地劳工条例（12/GM/88号批示）和输入技术劳工条例（49/GM/88号批示），澳门正式输入外劳，外劳群体由1988年的4,393人增长到回归前一年的32,013人，其中最多时年新增超过1.6万人。（详见图一）

图一：回归之前澳门外劳群体数量²⁴



21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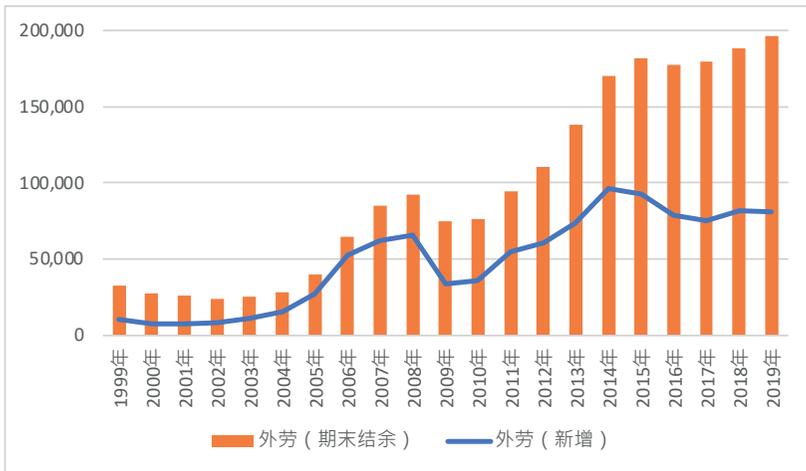
22 郭永利：《澳门外劳问题研究综述》，南京：《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第22-23页。

23 娄胜华：《回归后澳门社会结构的变动与治理方式调整》，北京：《港澳研究》，2014年第2期，第53-63+95页。

24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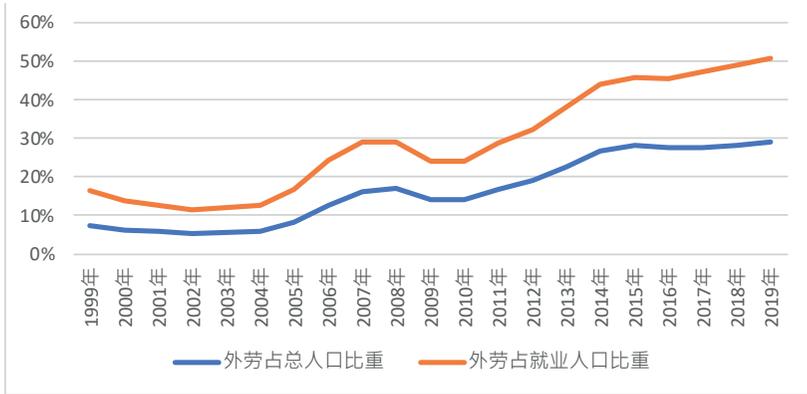
在【年份】澳门回归后，得益于博彩经营权开放“新政”与内地“港澳自由行”政策，澳门经济迎来蓬勃发展，外劳开始大规模进入澳门。截至2019年底，外劳规模达到196,538人，是回归当年32,138人的6.1倍，是1988年的44.7倍。其中最高峰时年新增外劳近10万人。（详见图二）

图二：回归以来澳门外劳群体数量²⁵



由图三可见，外劳群体占澳门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攀升，从回归时（1999年）的7%增长至2019年底的近三成，且占澳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从1999年的16%增长到过半数，可见外劳群体推动了澳门社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25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图三：回归以来澳门外劳数量占澳门人口比例²⁶

但是，正是对澳门而言非常重要的这一外劳群体，长期游离在社会边缘。图二也进一步说明，近年来在澳门外劳群体总体规模变动不大的情况下，每年均有数万人的新增数量，这意味着每年也有相当一批外劳离开澳门，反映了外劳群体无法融入澳门城市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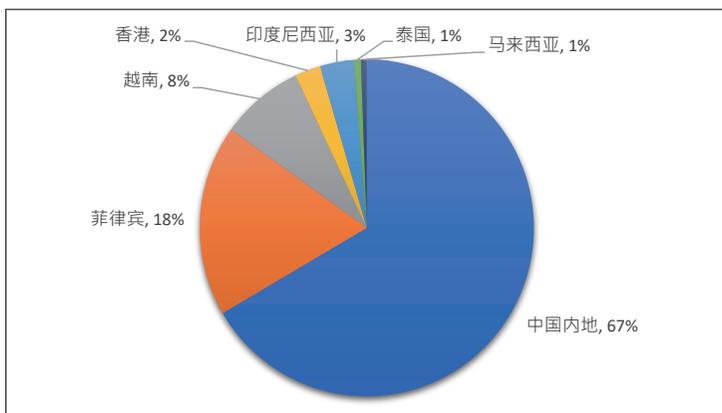
（二）澳门外劳群体的结构

不同的外劳群体对城市归属感有不同的心理要求，他们之前的特征与状况会影响到在务工城市这一新社会的社会适应。²⁷ 澳门外劳中，近七成来自中国内地（详见图四），虽然在一个国家之内，且广东、福建外劳居多，从语言和文化上看，相近或相通，似乎对于其社会融入不构成障碍。但是，初级的文化适应（包括语言、宗教信仰与其他文化特征）不必然导致结构性的融入。²⁸ 因为中国内地外劳群体进入澳门务工，首先要解决签注的问题，融入的基础是进入务工城市，澳门的移民政策是外劳首要跨越的一道门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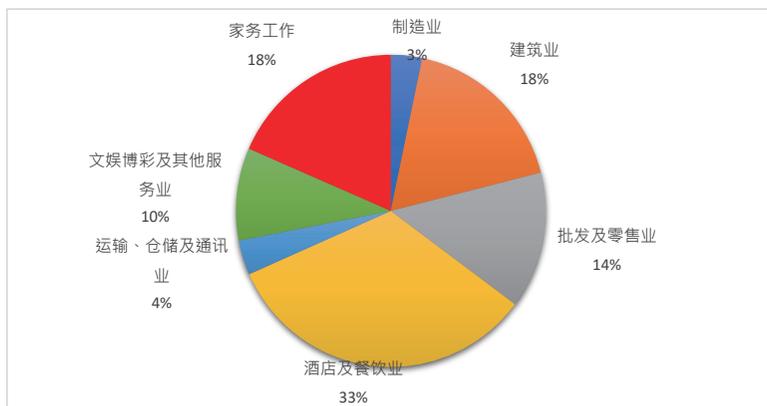
26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27 GOLDLUST, John; RICHMOND, Anthony H.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74, 8.2: 193-225.

28 DIETZ, Barbara; LEBOK, Uwe; POLIAN, Pavel. The Jewish Immigration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 German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2, 40. 2:29-48.

图四：2019年澳门外劳群体来源国家和地区²⁹

如果说文化适应是社会融合的初级阶段，而以就业、职业、收入等为代表的经济融入是其前提条件。从行业分布上看，澳门外劳群体主要从事酒店及餐饮业，其次是家务工作、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低技能体力劳动（详见图五）。一般而言，这些行业职业地位较低，收入降低、向上流动机会较小，不管是准入身份还是经济身份，都决定了外劳群体无法平等地被包容进澳门主流社会。

图五：2019年澳门外劳群体行业分布³⁰

29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30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这种低度的文化和经济融入极易导致弱势的外劳群体遭受社会排斥。限制了其进入社会组织的能力，造成了实际的机会不平等。³¹ 由于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融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包括澳门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均无法实现外劳享有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因此，外劳在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显得至关重要。

（三）四维度模型的测量

恩泽格尔的四维模型既包含了外劳对务工城市的适应和融入，也包含了务工城市主流社会对外劳群体发生的变化。³² 因此务工城市如果不能正确理性对待和接纳外来，尤其是政府没有包容和开放的外劳融入公共政策，将进一步刺激社会对外劳的排斥情绪，加剧本地居民与外劳群体的对立与冲突。因此，有必要在结构与文化的基本框架下，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维度进一步测量澳门社会在外劳群体形成城市归属感中的作用。

第一，就业市场、收入水平、社会福利和消费。首先，澳门特区政府输入劳动力政策的大前提是确保本地居民优先及持续就业，并会结合就业市场状况适时调控外劳的数量，澳门劳动力就业市场逐步为外劳缩减，且上升空间被压制；其次，虽然澳门劳动力月收入平均中位数达到 17,000 澳门元，在外劳较为集中的酒店及饮食业，劳动力月收入平均中位数为 12,000 澳门元，在澳门的收入远高于内地，如 2019 年广东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62,521 元，可见在收入方面对外劳的吸引力巨大。但是，本地居民劳动力的月收入平均中位数为 20,000 澳门元，酒店及饮食业本地居民劳动力更达到 16,000，这也反映出澳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突出；³³ 再次，《雇佣外地劳工法》中提到外劳定期接受健康检查、有权获提供住宿、交通费用等，除此之外，澳门社会的任何福利根

31 JUNGER-TAS, Josine.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ime.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2001, 9.1: 5-29.

32 肖子华、徐水源：《国外移民社会融合的维度构建》，载肖子华、徐水源：《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理论、指标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2 页。

33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 年 12 月 12 日。

本无法享受。虽然特区政府强制规定雇主为外劳向社保基金缴付费用用于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还是将费用负担转移给外劳身上。最后，澳门房屋市场供不应求，房租动辄上万，这对外劳是难以承受的，大量外劳因此选择居住和生活在珠海甚至中山，不仅增加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长期除了工作外并未在澳门逗留太长时间。

第二，社区交往与支持网络。澳门是社团社会，社团数量多、社团密度大，社团是澳门社区参与的主要力量和载体。澳门现有过万个社团组织，共有 16 个类别，但是劳工社团仅 250 余个。³⁴ 此外，涉及到外劳群体的社会组织是职业介绍所协会，主要职能是加强澳门与外地的劳务合作，正规的职业介绍所会跟进了解外劳状况及工资发放情况，敦促雇主加强施工安全，保障劳务人员的人身安全，设立公共咨询和投诉渠道。但是部分“黑中介”漫天要中介费，扣压外劳证件等损害外劳权益的不法行为仍然存在。这也凸显了澳门外劳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资源较少，其社会交往仅仅集中在居住地的工友、同乡或亲戚之间，与社会的互动渠道少之又少。

第三，公民身份、政治权利和工会参与。澳门现有投资移民、管理专才移民和技术专才移民等，对投资、行业和收入有严格的限制。近几年，每年获批居留的人数不超过 2,000 人，这对于大量从事低技能劳动的外劳来说难上加难。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非永久居民在澳门不享有政治权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³⁵ 另外，澳门立法会选举选民也为年满 18 周岁的澳门特区永久性居民。因此，外劳群体被澳门的政治拒之门外。一方面《工会法》在澳门立法会连续 11 次不通过，另一方面，本地工会力量的主流要求就是外雇退场。自 2006 年以来，外劳问题成为历次澳门“五一”大游行的重要议题之一，³⁶ 这样一来，在工会参与方面，澳门外劳也几无路可走。

34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 年 12 月 12 日。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https://www.gov.cn/test/2005-07/29/content_18300.htm，2021 年 12 月 20 日。

36 杨宜勇，魏义方，张志红：《澳门社会主要矛盾演进探析》，北京：《全球化》，2016 年第 7 期，第 89-98+134 页。

第四,规范习得、语言学习和观念认同。在外劳到达澳门之前,职业介绍所会做适应性培训,加强与雇主及外劳的交流,强化政策、业务、安全等方面的教育。由于语言相通,广东本地外劳备受青睐。近年来,澳门参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在内地大量引进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这部分员工与管理层、社会的语言障碍问题凸显。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社会还有宗教信仰的基础,不同精神文化和价值观激烈碰撞,理应是包容度相对较高的城市。然而,澳门社会并没有形成“来了就是澳门人”的理念,外劳群体亦自身也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澳门的一份子,加之特区政府针对外劳群体的社会矛盾的分类处理机制、矛盾要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多元化治理机制均有待完善,因此,外劳群体的城市归属感已成为制约澳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澳门外劳群体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以酒店业为例

城市归属感是对现居住城市进行全面评价的肯定程度,³⁷外劳对务工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其“外劳”身份的心理意识越弱。通过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维度的测量,似乎澳门外劳群体的城市归属感几乎为零。但是,不应忽视外劳的社会融入同样需要用人单位的支持。³⁸根据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澳门酒店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外劳群体与本地员工相处融洽,且关于“社会认同”的自我评价总体属于一个“中偏好”水平。³⁹而另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澳门酒店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外劳群体在澳门的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相较于部分澳门居民和工会团体的强烈排斥,出现了“超乎意料”的顺利融入效果。⁴⁰如前文所述,澳门外劳群

37 何艳玲,郑文强:《“留在我的城市”——公共服务体验对城市归属感的影响》,上海:《同济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78-86+103页。

38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39 曹世武,王新建,郑向敏:《澳门外地劳工社会认同研究——来自酒店业的调查》,南京:《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44-48页。

40 文彤:《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来员工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广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第93-99+132页。

体最为集中的就是酒店及饮食业，两项研究论证了由企业推动的外劳人力资本增加和社会资本的提高，在外劳社会融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人力资本

薪酬福利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相比本地员工，澳门外劳的收入较低。但是远远超出外劳来源地的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在外劳集中的酒店业，大部分外劳可以享有额外奖金或年终双薪，享有免费餐饮和住宿，保障了他们在澳门的日常生活，降低消费支出成本。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福利待遇，如医疗补助、保险和交通补贴等，这让澳门外劳在主观上产生希望融入本地社会的前提条件。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的变迁，提高了对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如澳门拥有世界最先进的五星级酒店群，对服务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相对而言，新外劳普遍缺乏与之匹配的素质和能力，因而在求职时容易被排斥劳动力市场、产业体系之外。但是，澳门酒店业拥有较高的员工培训率，甚至部分企业实现全员培训，进一步促进这部分外劳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同时，酒店企业在响应本地居民向上流动的政策基础上，努力打造多元化的团队，一些外劳获得职业升迁的机会，提升社会责任感。

（二）社会资本

澳门外劳群体往往以同乡作为主要的心理和物质支持网络，对澳门主流社会缺乏认知，常常自我边缘化；⁴¹然而，外劳必然要在务工城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本地居民展开互动交往，才能以更深层次融入当地社会。澳门酒店企业有意识地将外劳与本地居民混合在一起，参与工作、学习和团队建设，加强了解，增强互动，通过轮岗扩大交际面，提升外劳的行为适应。这些企业倡导在工作环境中杜绝一切歧视，还设立投诉和申诉的渠道，营造不管种族、宗教信仰、健康与否人人平等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通过组织成立由员工参与的义工队，服务社区，外劳群体亦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本地社会，融入本地居民的生活及活动中。这些举措均不断增强

41 梁启贤：《澳门外地劳工的生活处境与社会排斥》，澳门：《澳门研究》，2004年第10期，第155-162页。

外劳的社会资本。

（三）文化资本

只有当外劳对务工城市形成心理融入时，他们才算是真正融入到本地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融入。⁴²但是，澳门外劳群体多数保持着“过客”的心态，在心理上并没有将自己融入本地社会，甚至对当地社会产生抵触情绪。实际上，在澳门本地大型酒店的管理层，很多来自国外，企业内部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呈现多元化，能够帮助外劳开拓眼界、获得丰富的文化体验，进而对本地社会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更加深入。

由此可见，企业是外劳群体进入澳门社会的第一站，他们为外劳积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以更有效地融入澳门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外劳群体仍会被完全或部分地排除在澳门制度安排之外，在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等方面被区别性对待，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可能会有与本地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这些制度障碍难以消除。尤其是当外劳遇到企业无法解决的困难，这些依靠企业积累的社会资本是否有效，还有待检验。另外，外劳可以轻松地在企业实现对企业的认同、受尊重感和对自己的认同，但不一定能由此轻易形成对社会的心理认同。此外，并不是所有行业和企业都能够帮助外劳在澳门获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毕竟除酒店业外还有近七成的外劳群体。因此，人力资本对于澳门外来群体的城市归属感而言，是最基础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薪酬待遇和职业技能，外劳可以在其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产生对澳门城市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也仅限于，收入高于其来源地、消费支出成本低，那么这座城市是有吸引力的，外劳愿意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作出贡献。

42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南京：《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82-88+206页。

四、新冠疫情下的澳门外劳群体城市归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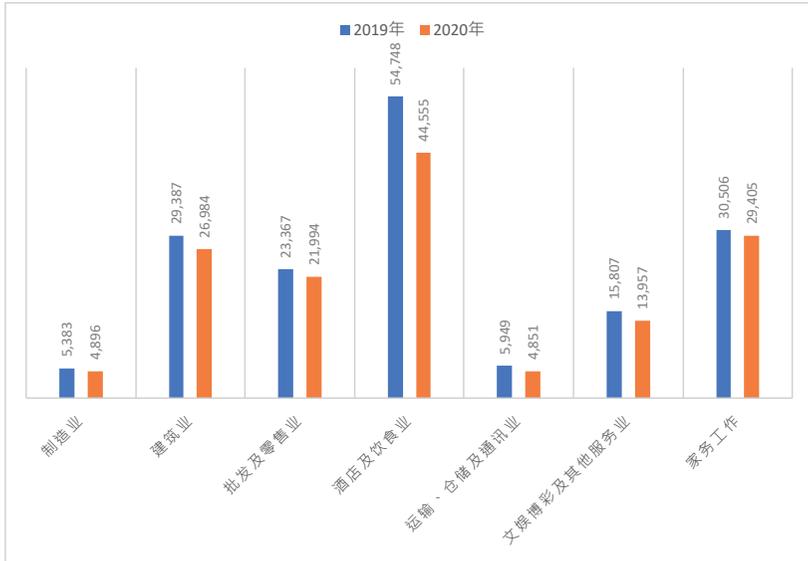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澳门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整体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就业不足，收入下降。⁴³受防疫形势严峻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影响，澳门外地雇员数量由2019年的196,538人降至2020年的177,663人，同时期新增外地雇员数量亦由80,689人降至51,544人。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雇员依然是主要力量，其数量减少最多（详见图六）；而各行业中，酒店及餐饮业使用外地雇员依然最多，但其数量下降的也最明显（详见图七）。

图六：2019-2020 澳门各国家（地区）外地雇员数量变化图⁴⁴



43 注：2020年，澳门整体失业率达2.5%，比2019年的1.7%高出0.8个百分点；就业不足率3.5%，比2019年的0.5%高出3个百分点，月工作中位数为15,000澳门元，比2019年的17,000澳门元下降2,000澳门元。同期，澳门本地居民失业率为3.6%，比2019年的2.3%高出1.3个百分点；本地居民就业不足率为4.1%，比2019年的0.6%高出3.5个百分点。以上数据来源于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44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图七：2019-2020 澳门各行业外地雇员数量变化图⁴⁵

在这一时期，新修改的《聘用外地雇员法》于10月份正式生效。该法律规范拟来澳从事非专业及家务工作的非居民须先取得“以工作为目的的入境凭证”，并须从澳门特区以外地区入境，方可获发“雇员身份的逗留许可”。在世界性疫情防控之下，直接导致外籍非居民或身处国外的非居民即使已获本地雇主聘请亦不能入境。这样一来，澳门外劳进退两难，同时社会对外雇群体的关怀有差。

一方面在“本地人优先”和“外雇退场”呼声高涨下的外劳进退两难。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外地雇员只是补充澳门本地雇员的不足。然而，受疫情影响，澳门经济的前景不明，整个澳门社会进一步将“外雇退场”作为“保本地居民就业”的重要举措，行政长官贺一诚在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到“完善外雇退场机制，切实保障本地居民就业权益”⁴⁶。还曾表示建筑业、家佣、服务业、制造

45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s://www.dsec.gov.mo/zh-MO/>，2021年12月12日。

46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二〇二〇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20/04/2020_policy_c.pdf，2021年12月20日。

业等工种，只要澳门人愿意去做，政府便会调整有关工种的外雇退场机制和调整外雇数量⁴⁷。澳门劳工事务局也在当年7月底时宣布，为保障本地人优先就业，会削减企业的外劳名额。⁴⁸就业市场进一步向本地人倾斜，而“外雇退场”的论调也极易撕裂社会，这既包括本地居民的矛盾，又包括本地居民与外劳群体的对立。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外劳群体的城市归属感进而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对本地人以及不同来源地外雇的关顾有别。外劳除了为澳门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还与澳门居民同舟共济、共抗疫情；然而澳门的抗疫惠民措施（如消费券）并未惠及外劳。在工作和收入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外劳工作和生活（如在澳门消费）的积极性势必深受打击。同时特区政府呼吁因应疫情防控需要，雇主可考虑聘请来自内地的外雇，这对非中国内地的外劳而言，外劳的就业市场进一步缩窄。由于外劳在政府甚至领事馆得到援助的优先性较低，而非政府组织的支援又不能一一关照到位，外劳的生活境况不一，尤其是那些被解雇或被放无薪假的外劳更是陷入困境。

在疫情期间，外劳的精神健康问题得到社会的关注，澳门明爱与澳门大学合作推出一款专为外劳提供精神支援的手机应用程序，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精神支援计划伸延至澳门。据调查，外劳认为薪酬、福利、每日工时不超过10小时、医疗保险以及消除歧视，能够保障非本地雇员精神健康。该项目的负责人表示，除忧郁外，部分外劳受失眠和焦虑影响，40%的求助个案都涉及财务困难。他们在朋友和教堂才能找到在社会上找不到的帮助。⁴⁹由此可见，在特殊时期，经济维度即就业市场、收入水准、社会福利和消费要素是影响外劳城市归属感的最基础因素，而社会维度即社区交往与支持网络要素则能够巩固和提升外劳对社会融合的感知。

47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记者会快讯（关于外雇退场机制）》，<https://www.gov.mo/zh-hant/news/352293/>，2021年12月20日。

48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劳工局关注疫情影响全力协助本地雇员就业》，<https://www.gov.mo/zh-hant/news/341692/>，2021年12月20日。

49 澳门大学：《澳大和明爱推计划协助海外菲律宾移工应对压力情绪》，<https://www.gov.mo/zh-hant/news/339267/>，2021年12月20日。

五、提升澳门外劳群体城市归属感的建议

准入政策待改进，社会保障未健全，政治权利几无，居民态度不包容，澳门外劳群体必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流动率高导致旧的外劳还没有实现社会融合，而新的外劳又将重新面对城市融入的问题。澳门外劳群体的社会融合，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要促使其产生对澳门的城市归属感，在制度性障碍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应从经济维度加以解决，持续夯实外劳的人力资本。

一是尊重外劳的劳动价值，力争同工同酬。澳门社会各界不能在没人干活或没人愿意干活的情况下才想起外劳，应该让外劳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劳动价值与收入相匹配，劳动成果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避免克扣工资、拖欠工资、压低实际工资的行为，企业、工会、劳工事务局和社会组织应进一步强化对外来工资权益的维护渠道，加大对侵犯外劳经济权益的打击力度。尤其在澳门本地居民不愿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中，减少外劳与本地居民的平均工资收入差异，从而真正让外劳群体在澳门收获同工同酬的公平感，至少确保外劳群体在劳动所得方面产生同城同权的归属感。此外，在澳门新兴产业领域，加大对管理类和专业技术类外劳的薪酬激励措施，进一步激发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贡献才能的积极性。

二是完善外劳的社会福利，丰富补助类型。让庞大的外劳群体享受澳门社会福利不大现实，但不应忽视外劳为创造澳门本地优越的保障制度做出的贡献。澳门特区政府和工商界应当重视外劳的社会福利、企业福利的获得感，现实可行的包括住房补贴和交通补贴，降低其因往返珠海——澳门时间成本增加和出行不易的心理负担。由于大量内地外劳在澳门务工后最终还将返回内地，其医疗和养老还是依靠内地的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因此，在本地用工企业成本压力可控的情况下，为外劳补贴其缴纳的内地社会保险费用，可以提升外劳对澳门社会的认可度。

三是强化外劳的职业培训，增加竞争能力。澳门社会面临“高级专业人才不足”、“基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除提升本地劳动力的职业素养外，还应当注重对外劳职业技能的提升。作为澳门劳动力的补充，外劳输入具有暂时性、限业限量的特征，但一定要确保其有足够的职业素养参与到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强化外劳的职业培训，是澳门产业竞争优势的保障。只要外劳的职业技能与

产业发展相匹配，更容易适应澳门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在工作中游刃有余，避免产生无所适从的心理。

四是畅通外劳的上升通道，提升职业地位。在本地居民优先就业和向上、横向流动的大原则下，澳门应给外劳群体一定的上升空间。一方面通过提升职业升迁，提升外劳的职业地位，降低社会层次落差；另一方面确保外劳离开澳门回到来源地或前赴其他地区务工时，有较高的职业层次，在就业市场中获得更高层面的职业机会，这也算是澳门为外劳对城市贡献的回馈。

试想，一批拥有高收入基础、国际化职业背景、国际化培训背景和较高职业地位的外劳离开澳门后，不管是从事酒店餐饮、建筑制造，亦或是家务工作，由于拥有较强的职业竞争力，他们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只要澳门特区政府和工商界开放思想，本地居民提升包容度，用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共同打造一个包容共济的城市精神，外劳对澳门城市的满意和依恋程度将会与日俱增。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新一批的外劳在进入澳门务工之前，更容易在心理上对澳门社会有更优综合判断，而奠定社会融合和城市归属感的心理与期望。